

加拿大外交政策改变与加拿大广播电视节目“The National”的种族主义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七

[John Price](#) / 2022 年 1 月 25 日



已故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历史所前负责人格雷格·多纳希 (Greg Donaghy) 表示，皮埃尔·特鲁多 (Pierre Trudeau) “政府采取的与中国、日本及其它亚洲国家之间保持累积不间断的接触代表了一个未被外界充分认识到的具有一贯性的外交政策战略。” 摄影：Peter Bregg/加拿大通讯社。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资深记者大卫·克莱恩（David Crane）最近在渥太华的《希尔时报》（The Hill Times）上撰文指出，“中国”一词在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给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Mélanie Joly）的授权信中一次也没有出现。

“面对美国不断鼓动反华冷战，并迫使我们加入，”克莱恩说，“当务之急是加拿大必须独立确定自己的最佳利益，而不是被美国拖着走。”

克莱恩关于独立外交政策必要性的观点得到了加拿大许多人的赞同。然而，特鲁多却似乎是铁了心要把加拿大拉向相反的方向。

特鲁多给乔利的授权信中充满了关于和解、民主和人权的美好措辞，明确表达了他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我们与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并且“制定和启动一项全面的印太战略，以深化该地区的外交、经济和防务伙伴关系以及国际援助”。

这一战略只会进一步使加拿大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挑衅动作保持一致，最终可能导致灾难。

特鲁多是有选择的。之前的总理曾经有站出来反对美国的时刻，甚至是在面临极端压力的情况下。这些时刻不应被遗忘。

伊拉克、古巴、中国

2003年，当时的总理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巨大压力，要求他支持入侵伊拉克的提议，理由是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错误情报。

克雷蒂安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劳德·拉弗杜 (Claude Laverdue) 回忆说，在一次会面中，布莱尔“勃然大怒，气疯了，完全气疯了，克雷蒂安首相变得烦躁不安.....布莱尔一直不停地对让·克雷蒂安说‘难道你看不到吗，我们得到的是同样的报告’，克雷蒂安回答说‘不，我没有看到’。” 最终，克雷蒂安拒绝了支持入侵伊拉克的行动。

我依然记得那个决定向民众公开的那一时刻。作为 2003 年全民反战大动员的参与者，活动结束后，我松了一口气，我的孩子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加拿大政府是可以与美国主导的侵略保持距离的。

伊拉克不是唯一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古巴。

莱斯特·皮尔逊 (Lester Pearson) 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在古巴问题上坚持美国的路线，甚至反对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访问蒙特利尔的 1967 年世博会，这违反了外交协议。

皮埃尔·特鲁多 (Pierre Trudeau) 在 1968 年成为总理后，改变了加拿大的路线，会见了时任古巴驻加拿大大使佩佩·费尔南德斯 (Pepe Fernández)，并用西班牙语交换了意见。[1] 特鲁多于 1976 年访问古巴，访问期间他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特鲁多在对 25,000 名古巴群众发表讲话时用西班牙语喊道，“古巴万岁，古巴人民万岁.....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万岁。古巴-加拿人民友谊万岁”。

特鲁多不害怕与美国制裁和抵制古巴的政策对着干。加拿大人从中受益匪浅，在 COVID 之前的十年中，每年有超过 100 万人前往古巴旅游。数百家公司在古巴拥有经济利益，古巴成为加拿大在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

难怪卡斯特罗被邀请在 2000 年特鲁多的葬礼上担任特邀扶灵嘉宾。

但这位前总理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对美国的反古巴运动持反对态度的人。

更早的十年前，约翰·迪芬贝克 (John Diefenbaker) 拒绝加入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与古巴断绝关系的行动，拒绝支持美国的经济禁运。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反对美国的任性行为，建议由联合国派观察员前往古巴，确定有关核武器的情况。

如果特鲁多今天在对待美国侵略的问题上继续奉行绥靖的路线，难道我们明天不会对古巴实施制裁吗？

1957年，迪芬贝克也违反了对中国出口的制裁——促成加拿大小麦出口到中国。在此之前，加拿大政府一直严格遵守当时的美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只承认台湾政权。[2]

然而，当美国小麦充斥市场时，迪芬贝克“理所当然地无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位总统则焦躁不安，无所措手足。”

几年后，当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取代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担任总理时，他延续了迪芬贝克的固执，并且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1970年10月13日，经过在瑞典举行的艰难谈判，他与美国的政策做了切割，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说两国都从相互承认中受益。这只能是一个极为保守的说法。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此举非但没有引起美国的愤怒，几年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学习加拿大做了同样的事情。

种族主义与替代方法的边缘化

在加拿大，要求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们在孟晚舟事件中听到了他们的声音——100多名加拿大外交官呼吁特鲁多释放孟晚舟，前总理克雷蒂安和19名前政治家和外交官包括路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劳埃德·阿克斯沃西（Lloyd Axworthy）和埃德·布罗德本特（Ed Broadbent）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新民主党议员尼基·阿什顿（Niki Ashton）发起了一份请愿书，呼吁释放孟晚舟，汉密尔顿停止战争联盟（Hamilton Coalition to Stop the War）在加拿大范围内发起了一场要求释放她的运动。许多国际事务专家持续发声，要求加拿大在中国和亚太的问题上保持自己独立的政策。例如，渥太华大学的帕斯卡尔·马索特（Pascale

Massot) 指出，加拿大面对的未来是一个后霸权、多中心的世界秩序，外交政策不应该只用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二元对立的观点来衡量，必需要有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法。[3]

这并不意味着要用交易的方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中国密切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也有很强的原则性。” 马索特还指出了（一味追随美国）有可能被卷入“与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斗争，这不符合加拿大的利益”。即将到来的全球多中心治理时代需要建立一种基于“适应性、组合式、和战略理念”的对华政策。

同样，参议员胡元豹 (Yuen Pau Woo) 也提出，需要承认中国是一个“地球上的邻居”，究竟是好邻居还是坏邻居，取决于你的观点，但不是一个可以被欺负或忽视的邻居。[4] “很多时候，放在面前的选择要么是‘看不到邪恶’（中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市场），要么是‘只看到邪恶’（中国是一个威胁）。他的结论是，“选择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都只会把加拿大带入死胡同。”

还有许多其他人，包括约克大学的 Gregory Chin，他最近在一次公开采访中阐述了“中国故事的新元素”。

这些声音，以及加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亚太基金会的声音，在关于中国的公开讨论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而讨论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带有毒性。

一个明显可见的最近例子是上周在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新闻的旗舰节目《国家新闻》（“The National”）上播出的一篇关于所谓的“中国工业间谍活动”的新闻报道。这部出自特伦斯·麦肯纳 (Terence McKenna) 之笔的八分钟专题报道，创下了有关中国偏见报道的新低。

节目的将大部分时间分别分配给了三位著名反华言论代表——查尔斯·伯顿 (Charles Burton)、乔安娜·邱 (Joanna Chiu) 和迈克尔·钟 (Michael Chong) ——和三名加拿大间谍：加拿大国家情报局主任大卫·维尼奥特 (David Vigneault)、前局长理查德·法登 (Richard Fadden) 和前特工米歇尔·朱诺-卡苏亚 (Michel Juneau-Katsuya)。留给唯

一的不同意见持有者参议员胡元豹 (Yuen Pau Woo) 的只有不到 30 秒的时间，而且随后便立即对他的观点加以反驳。

《国家新闻》 (The National) 节目的专题报道突出报道了受 CSIS 启发而发生的获奖科学家邱香果博士遭到解雇一事，但却避而不谈同行科学家们对她的持续支持，闭口不提 CSIS 建议政府不要公布重要证据，因为这些证据可能会泄露他们的秘密间谍活动，而这些活动有一些可能是非法的。2019 年 7 月，邱和她的生物学家丈夫程克定 (Keding Cheng) 被撤销了安全许可，并被驱逐出温尼伯的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同时被驱逐的还有他们的几名国际学生研究生。目前尚不清楚他们被解雇的原因。

这个节目给了米歇尔·朱诺-卡苏亚 (Michel Juneau-Katsuya) 大量的出镜时间，米歇尔·朱诺-卡苏亚是一名前 CSIS 特工，现在似乎成了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常用的外包商，专门提供有关间谍活动方面的权威意见。但是，加拿大广播公司从来不提朱诺-卡苏亚因在《间谍之巢》一书中诬告华裔都是中国政府代理人一事被亚裔加拿大人成功起诉这件事，而是突出报道朱诺-卡苏亚发表的有关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 (Nortel) 倒闭原因的意见。朱诺-卡苏亚认为是中国黑客的攻击，其中有中国公司华为的参与，致使北方电讯公司关门。充其量，这只不过是一种搭一点边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商业评论员的支持。而关于美国间谍在十多年前就入侵了华为总部，加拿大间谍机构对此给予支持，作为“五眼”全球间谍网络行动的一部分，对这件事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节目却没有任何报道。

这篇文章提到了最近一名哈佛大学白人科学家因没有报告他从中国大学收到的资助款而被定罪，但却只字不提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因其种族划线而受到尖锐批评之事。据《纽约时报》报道，因为缺乏证据，美国司法部被迫撤销对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陈刚博士的指控，“遭受了令人尴尬的挫折”。

CBC 节目也没有报道 CSIS 曾经是一些误判案件背后的推手，如加拿大工程师黄清 (Qing Quentin Huang) 被捕案，黄清在被捕八年后法院将对他的指控判为搁置。也没有报道代表 1000 名加拿大华裔学者的两个协会的抗议活动，抗议发生在加拿大大学的种族定性事件，而种族定性事件的发生是 CSIS 赞助的对加拿大高等教育机构干预的结果。

所有这些相反的信息都在公共领域，很容易查找，但显然特伦斯·麦肯纳和《国家新闻》节目对这些信息漠不关心，不愿查找。

在去年的一篇颇有见地的评论中，胡元豹和 UBC 教授保罗·埃文斯 (Paul Evans) 指出了“加拿大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几乎全部都是负面的”这一事实。他们追问：“反华情绪在全国范围内增长，对亚裔的仇恨也在升温。这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国家新闻》节目的专题报道极好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

在反华采访中不断穿插的刻板印象画面中，中国人民群众和中国军队整齐划一的队列行进场面，触发了观众脑海深处的早期印象，让人想起曾经的“黄祸”，成群结队的亚洲异教徒驻足门外，等待着入侵白种人的加拿大或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新闻媒体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描绘成一群难以理解的政治狂热分子，一个墨守成规的驯服的蓝衣蚁族部落”时，这些早期的种族主义形象便再次死灰复燃，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克莱因 (Christian Klein) 如是说。[5]



《环球邮报》的插图，类似的反华图片是恐华症的常见表现。

现在，《国家新闻》节目正在使这些形象满血复活：其中包括被洗脑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准备同加拿大开战，而中国的公司及其在加拿大的代理人就是他们的“第五纵队”。这种做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专门针对日本和日裔加拿大人制作的“黄祸”形象，导致 1942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对日裔加拿大人的种族清洗，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

《国家新闻》的特别节目可以有效地被当成新闻，并“停留”在人们的印象中，因为它使用了触动内心的语言和图像：它们从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的深井里汲取过去出现过的形象，这

些随着病毒的大流行而复活的形象，这些被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推波助澜，四处扩散的形象。[6]

长期以来，反亚裔种族主义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一直是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Kent Wong 和 Stewart Kwoh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简明扼要地指出：“美国反亚裔暴力的长期悲剧遗产与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直接相关。”

“在对待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态度上，家长作风和对黄祸的恐惧保持了惊人的活力和持久性，” 布兰登·P·濑户 (Brandon P. Seto) 总结道，它们提醒我们“关于‘东方’人群体的视觉语言依然无处不在，但人们对此却往往并无知觉。这种无法逾越的差异渗透了我们对未来主义反乌托邦的感觉。”

《国家新闻》节目欠这个国家，特别是亚裔加拿大人一个道歉，因为煽动了偏见和仇恨的火焰。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必需发起对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以避免将加拿大带入通向战争之路。

John Pric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uthor of Orienting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newly formed Canada-China Focus, a project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加拿大定位》 (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 (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John M. Kirk and Peter McKenna, “Deciphering Canada’s Cuba Policy since 195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ban Studies*, 2.1/2 (Spring/Summer 2010), pp. 62-73.

[2] Greg Donaghy, "Pierre Trudeau and Canada's Pacific tilt, 1945–1984," *International Journal*, 74.1 (2019), 141.

[3] Pascale Massot, "Global Order, U.S.-China Relations and Chinese Behaviour: The Ground is Shifting, Canada Must Adju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74.4 (2019), 600-611.

[4] Yuen Pau Woo, "What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Canada? Towards a Rethinking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76.1(2021), 145-153.

[5]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76.

[6] Gerald Roche, "[The Epidemiology of Sinophobia](#)," *Made in China Journal*, 1 (January-April, 2020).